



泥土里飞出欢乐的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张燕



歌者意切切,听来情真真。这首咸安山歌——《欢乐地》,由咸安区群艺馆打造,或唱或听,优美的旋律使人陶醉,熟悉咸安风俗民情的人,还会想起那些妙趣横生的本地民谣和传说故事。

1 传统山歌赋予新生

为了挖掘民间文化,推进文旅深度融合,2019年10月,咸安区群艺馆组织市、区相关专家,深入汀泗、桂花、高桥等农村一带进行采风。

“走访时发现,很多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即兴哼几句。”咸安区群艺馆工作人员回忆山歌搜集情景时说道。有一位年逾古稀的村民,之前在城区和孩子一起生活,只有节假日才回老家,恰好这次碰上了面,双方抓紧时机,整理了一些山歌唱段。

“我们通过每个乡镇的文化站,找到乡间会唱山歌的民间艺人,一曲一曲地唱,把他们会唱的山歌全都唱出来。”咸安区群艺馆馆长罗利民介绍说,采风人员将艺人们唱的山歌全部录音,回来后反复试听,记出曲谱,然后结合《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湖北卷 咸宁市歌谣分册》的歌谣歌词整理而成,并以咸安山歌曲牌《欢乐地》命名。

咸宁人自古以来爱唱山歌,通山、咸安一带有山歌是这样描述:“日里唱歌当茶饭,夜里唱歌当被窝,半夜三更唱歌当老婆。”这说明唱歌成了大家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咸宁长篇叙事山歌取材于当地的真人真事,也有根据民间广泛流传的人文故事改编而成。

而咸宁山歌大致可以分为小调、山歌、号子三大类,又可以分成若干小类。咸宁山歌的内容多为爱情和诉苦歌。咸宁方言属于“赣语系”,因而导致民歌色彩与湖北省其它地区有较大差异。

在收集咸安山歌的同时,区群艺馆的工作人员还深入乡村,与乡亲们聊天,了解当地民风民俗、红白喜事流程等等,力求内容丰富、生动、有趣。

咸安区群艺馆找到了剧团退休演员、出生于桂花镇白沙桥、人称咸安“刘三姐”的曹细英老师。曹细英很快掌握了旋律,录制出小样,并和该群艺馆的辅导老师高俊平一起着手教唱工作。



(上接第四版)危急时刻,马识途不顾个人安危,及时赶到成都走马街电报局,给香港的联络员倪子明发电报:“家父病危入院即归。”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向钱瑛报告蒲华辅被捕和他要去香港的情报。接着,马识途又赶到另一个电报局,分别给川北、川南、西昌3个工委打电报报警。随后,马识途与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冒着生命危险,用半个月的时间,按照隐蔽斗争的规定,将蒲华辅认识的党员全部疏散和转移出去。

完成这些任务后,马识途又一次赶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钱瑛一见到马识途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终于平安到达了,我就放心了。”接着,她又焦急地问道:“你快说说川康特委党组织被特务破坏的情况,老蒲是不是被捕叛变了,漏洞堵得怎么样?”

马识途说:“大姐,我先说个大概,再详细汇报。第一,老蒲的确被捕叛变了;第二,漏洞已经堵住了,除了老蒲直接领导的统战和军事系统的少数党员外,成都市委和各地工委以下的各级党组织,都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全部疏散出去,敌人再也没有能突破我们的防线,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听到这里,钱瑛紧绷的神情逐渐放松下来,高兴地对管家喊道:“老陈,中午做点好吃的吧!给老马洗洗,我也在这里吃。”

钱瑛沉思一会儿说:“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疏散工作,挡住了敌人向你们冲击的第一波浪潮,稳住了自己的队伍。但是疏散工作做得还不彻底,还有漏洞。比如成都市委的领导干部虽然疏散隐蔽了,有的却还留在成都,还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不要说老蒲已经叛变,出卖了组织,就是他很坚定,没有出问题,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被捕党员认识的所有下级领导同志,一律都要撤退,才可能彻底堵住漏洞。特委委员王宇光现在只是转移到重庆,老蒲叛变后会带着特务一起到重庆,千方百计找到王宇光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撤退到重庆也不行,老蒲认识他,而且知道他是跛子,敌人要在重庆查找一个像他那个样子的跛子是不难的。”

马识途解释说:“全把他们撤走了,成都和重庆正在展开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没有党

“南山烧火北山烟,河水烧茶不着盐,关公磨刀不要水,好牛好马不用鞭……”《欢乐地》的音乐视频制作好后,在网上炮而红,听者甚众。咸安汀泗桥镇黄荆塘村的樊玉兰在儿媳的帮助下学会用电脑上网,也跟着唱山歌自娱自乐。虽然没有视频里的演员唱得专业,但也别有一番滋味。

“咸安的山歌优美动听,带着家乡的泥土芬芳。这么好的音乐不能继续沉睡,不能长期被遗忘。”罗利民有着难解的情怀。

《欢乐地》MV拍摄地点选在咸安区高桥镇。高桥镇老一辈的村民基本上都是居住在山区,有唱山歌的传统。乡亲们在地里、山上劳作时,哼几句山歌可以打发时间,而且当人们忙碌了一天,晚上饭后在

2 乡里乡亲原味表演

屋前屋后乘凉时,山歌也成了一种有趣的娱乐方式。

不过,制作MV时有点小插曲。高桥当地口语与地道的咸安方言存在一定差异,参加培训的群众放不开嗓,辅导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为村民们纠正。而且毕竟是群众演员,有很多地方不是那么正规,演出表情、神态、流程方面,有些不太到位,人物抓的也不细致。

咸安区文旅局副局长黄洁反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动员村民相互教习、相互纠正口音,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村民们终于学会了。每个人的唱腔、表演,一场戏与一场戏之间的衔接也好,节奏也好,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听起来节奏就特别强,进一步增加了整体的表演力。

3 打造民间文化品牌

《欢乐地》在保持咸安山歌原始风貌基础上,表演形式大胆创新,既有服装道具,又有领唱、群唱的表演形式,让人眼前一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咸安山歌这种口头传承的民间艺术,也在不断传承中衍化与完善,它的艺术风格也是在这种传承过程中得以形成。

“现在唱山歌的人越来越少了,这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年轻人都追求新颖、时尚的东西,对山歌不感兴趣了。现在会唱山歌的人都是一些老人家,年轻人很少会唱山歌。咸安山歌的传承与发展也面临这严峻的考验,担心随时都有可能失传!”谈及咸安山歌的现状,咸安凤凰社区的老艺人黄麒麟有些忧心忡忡。

“让歌曲传播得广,让不同地域的听众都能欣赏。”咸安区群艺馆的工作人员认为,与传统山歌相比,网络山歌有很大自由空间。这种山歌文化形式,

也能吸引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有利于本土山歌的传承发展。如何秉承咸安传统山歌优良传统,引导其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咸安山歌的社会功能和传播作用,也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咸安的山歌就像遗落在民间的一颗非遗明珠,等着被我们去发现,去打磨与擦亮。”谈及制作山歌《欢乐地》的初衷,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黄洁说。

据悉,为进一步推广咸安山歌,咸安区文旅局下一步将举办万人传唱活动,还将打造一部山歌剧,擦亮咸安山歌这张文化名片。

“也希望能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对咸安山歌进行宣传。”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能积极搭建平台,举办各种群众性山歌赛事活动,邀请报刊、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参与,扩大对外影响。通过宣传推介,不断扩大咸安山歌的知名度。

下接管武汉。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钱瑛把马识途等人带到武汉,参加城市接管工作,让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迎接湖南、四川、贵州的解放。

四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先后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等职。马识途先后担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以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联主席等职。



1954年10月,参加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员合影。前排右起:李先念、乌兰夫、邓小平、贺龙、彭德怀、何香凝、周恩来、陈云、邓子恢、李富春、章伯钧;二排右起:傅作义、章乃器、叶季壮、陈郁、蒋光鼐、钱瑛、谢觉哉、史良、李德全、习仲勋、马文瑞、赵尔陆;三排右起:杨秀峰、贾拓夫、曾山、沈雁冰、沙千里、梁希、罗瑞卿、廖鲁言、张奚若、朱学范、薄一波、黄敬、王鹤寿。

钱瑛虽然身居高位,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曾经跟随她出生入死的部下。马识途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望钱瑛,钱瑛关切地询问着每一名干部的情况,既为进步快的同志高兴,也为犯错误的同志惋惜。她请马识途转告大家一定要有过关的思想准备,民主主义这一关是走过来了,现在又面临着社会主义这一关,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改造的艰巨任务,既不要畏首畏尾,也不要满不在乎,总之不要掉队,才能少摔跤。谈到1948年的香港整风,马识途笑着对钱瑛说:“那个时候你把我整得好痛啊!”钱瑛则说:“有几个地区没有时间这么整,以至于有一些同志犯错误,革命可没有人股分红的

潜任思想呀!”这些看似闲谈的教诲,让马识途受益匪浅。

时间倒回到1948年4月,国民党特务经过精心侦察,发现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线索,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陈然、彭咏梧、江竹筠、罗广斌等党员干部133人先后被捕,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的重大损失。刘国定还亲自带领特务前往上海抓捕钱瑛,所幸钱瑛早在半年前已经转移到香港。

被捕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多数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绝大多数共产党员英勇不屈,坚持斗争,谱写了一曲曲令人枪然泪下的人生壮歌。1949年9月至11月,随着解放西南战役的迅猛推进,敌人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先后有300多人被杀害,仅有35人侥幸脱险。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先后撰写了《圣洁的鲜花》《江姐》《小萝卜头》等报告文学和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20世纪50年代,罗广斌、杨益言以监狱斗争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红岩》,经过马识途联络,钱瑛破例同意接受罗广斌等人的采访,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时重庆地下党的情况,以及众多革命英雄的事迹,但不愿意更多地谈自己。1961年12月,《红岩》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113次,再版2次,发行超过1000万册。

刘惠馨牺牲后,女儿下落不明。马识途因为从事隐蔽斗争,不敢公开寻找女儿,只能偷偷托人打听,但一直杳无音信。新中国成立后,在钱瑛的鼓励和帮助下,马识途给湖北省公安厅写了报告,湖北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经过一年多的查找,终于在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帮助他找到了被武汉工人夫妇偷偷收养、改名叫吴翠兰的女儿。此时,吴翠兰正在北京工业学院一年级就读。马识途获悉后立即飞到北京,意外获知如何功伟的遗孤何继伟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抱着两个孩子,马识途潸然泪下。五一劳动节那天,马识途带着女儿来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他告诉爱妻刘

《人民政协报》一行

考察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

本报讯 通讯员薛晓阳报道:9月27日,《人民政协报》副社长许水涛一行专程来咸宁考察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

考察组一行先后参观了向阳湖文化名人纪念馆和旧址核心区,高度评价抢救向阳湖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考察组指出,要进一步做好旧址保护工作,开展好档案史料、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工作。《人民政协报》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对咸宁和向阳湖的宣传力度。

工信部专家组到赤壁

现场核查国家工业遗产

本报讯 通讯员李秀峰报道:近日,工信部国家工业遗产认定现场核查专家组一行莅临赤壁市,对该市已列入工信部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核查名单的二三四八工程二处蒲纺纺织厂、中华老字号川字牌酱油厂(赵李桥茶厂)两处工业遗产进行现场核查。

核查中,专家组听取了该市相关负责人关于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的工作汇报,对该市申报的工业遗产项目进行了现场审核,实地查看了遗产项目核心物项的保存现状,并就进一步做好工业遗产项目的挖掘保护、开发利用和整理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

《镇志》书稿通过评审

本报讯 通讯员龙腾报道:近日,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横沟桥镇志》(稿)通过了咸安区史志研究中心专家组的评审验收。

《横沟桥镇志》(稿)是横沟桥镇有史以来第一部乡镇志书,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成书。全书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后记外,共设19编,66章,212节,约60余万字。

经过众多专家热情激烈的评审,一致认为《横沟桥镇志》(稿)体例齐全,资料比较丰富翔实,记述符合总体,语言简洁流畅。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基础较好的志稿。同意在修改完善后,志稿送出版社,进入公开出版程序。

本土画家刘三多

《时代之歌》巡展今日启动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记者采访市美术馆获悉,《时代之歌》刘三多师生美术作品展于今日上午10:30在咸宁市美术馆启动,本次展览将展出到12月上旬。

81岁高龄的刘三多是从咸宁走出的享誉画坛的著名画家,早年创作的大型油画《地下长城》,就以鲜明生动、清新秀丽的女民兵形象震动画坛。1980年代,他创作的油画《老黄牛》,仿佛横空出世,其摄人心魄的老黄牛形象,精湛细腻的笔触,在展览会上征服了许多观众。其大部分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此次的画展,还会有区内外一些青年画者的作品也会崭露头角,将令人耳目一新。”市美术馆工作人员介绍,场馆免费观展时间为上午8:00—12:00,下午2:30—8:00(节假日不休息,周一闭馆),欢迎广大市民及艺术爱好者参加。

惠馨,女儿终于找到了!

马识途找到失散20年的女儿,一时传为佳话。在四川省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动员下,马识途以亲身经历为题材撰写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尚未完稿就开始在《四川文学》《成都晚报》上连载,一时洛阳纸贵。

《清江壮歌》完稿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商定两家同时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和四川作协专家对书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马识途到北京修改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付排,再派人把清样送到成都,等马识途审定后即可付梓出版。

1978年夏天,刚刚获得平反的马识途,照例去看望钱瑛。一见面,钱瑛就问道:“你写的长篇小说出版没有?”马识途回答说:“出版社送来清样,等我最后定稿,他们就要付印了。”钱瑛说:“幸好没有付印,你千万不要拿去出版了。”马识途不解地问为什么?钱瑛告诉他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小说《刘志丹》的情况,马识途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此后他以工作繁忙为由,迟迟未交已经修改好的书稿。直到1966年春,在多方催促下,《清江壮歌》才姗姗出版,首印20万册。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清江壮歌》成为“大毒草”,遭到口诛笔伐,马识途被打倒,遭受6年牢狱之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瑛受到严重冲击。1966年12月底,她戴上“黑线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自首”“特嫌”4顶大帽子,遭到“隔离审查”,1973年含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亲自主持下,钱瑛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3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钱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邓颖超主持,廖承志致悼词。

1978年夏天,刚刚获得平反的马识途、洪德铭来到北京,在原北平(南系)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的“斗室”相聚。“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三位当年西南联大的校友劫后重逢,回忆起当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那段难忘的岁月,不禁激动万分,谈到钱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个个潸然泪下。第二天结伴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钱瑛的骨灰盒前献上一束鲜花。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七期)